

行動與能動性

-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對戰略研究的啟發

作者：羅慶生、陳文政

本文發表於 2014 年國際關係學會年會，2014 年 11 月

摘要

建構主義雖然是探討國際關係的理論，近年卻逐漸向安全研究領域擴展。不過這些屬於安全範疇的研究並不屬於戰略領域，因為他們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提出新的見解，卻較少甚至完全不觸及傳統安全的軍事與外交議題。因此對安全研究已有重大貢獻的建構主義，是否也能對探討武力使用意義的戰略研究有所啟發？戰略研究這個被定義為「政治學科項下探討國家間政治關係中使用武力意義的研究」的學科，因國家中心、行為者理性、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權力與安全...等基本假定而被歸類為現實主義學派，在理論準則以及對各安全問題的觀點上與建構主義有相當大的區別。然而，兩者雖然有不同的科學哲學基礎，但或許正因為這種差異，反而有機會提供因堅持武力議題而陷入典範困境的戰略研究一些新的視野或研究途徑。本文嘗試以建構主義觀點探討戰略研究的問題，指出當前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現象限制了武力在處理國際衝突上的功能，使得強調武力的戰略行動者喪失能動性。然而這種國際政治的非武力結構，卻是國家使用武力的戰略所造成的。戰略計畫者要突破此一結構性限制，必須尋求武力之外的戰略工具，才能凸顯能動性，使戰略行動具有意義。

前言

建構主義雖然是探討國際關係的理論，近年卻逐漸向安全研究領域擴展，法國學者戴維（Charles-Philippe David）將建構主義列為五個安全研究理論學派之一，¹英國學者布贊（Barry Gordon Buzan）在探討國際安全研究對安全問題的不同觀點時還進一步將建構主義區分傳統與批判兩個不同學派；²台灣也有相當多的學者運用建構主義探討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兩岸關係。³不過，至目前為止，這些學者的研究範疇仍多屬於安全研究，而不是戰略領域；或者說，他們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提出新的見解，卻較少甚至完全不觸及傳統安全領域中的軍事與外交議題。戰略研究這個被定義為「政治學科項下探討國家間政治關係中使用武力意義的研究」的學科，⁴無論是維持早期國際關係次領域的定位，或如近期部份學者所主張的歸屬於安全研究項下，⁵都因其國家中心、行為者理性、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權力與安全……等基本假定而被歸類為現實主義學派，⁶或至少主張兩者有相同的科學哲學基礎；而從戴維對安全研究學派的分判或布贊的研究，可理解戰略研究／現實主義在理論基礎以及對各安全問題的觀點上，與建構主義有相當大的區別。因此，當學者們承認建構主義對安全研究已有重大貢獻時，是否也能對探討武力使用意義的戰略研究領域有所啟發？建構主義與戰略研究雖然有不同的科學哲學基礎，但或許正因為這種差異，反而有機會提供因武力議題喪失而陷入典範困境的戰略研究一些新的視野或研究途徑？⁷就是我們所深

¹ 請參閱 Charles-Philippe David 著，王忠菊譯，《安全與戰略：戰爭與和平的現時代解決方案》（La guerre et la paix : Approch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 stratégie）（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一章。

² Barry Buzan 著，〈論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架構〉，浙江大學編譯，《非傳統安全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頁 20-40。

³ 這些學者至少包括翁明賢、黃清賢、袁易、葉定國等。請參閱：翁明賢，《解構與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2000-2008）》（台北：五南，2010）；翁明賢，〈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建構主義的觀點〉，《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27 期（2004 年 9 月），頁 11-18；袁易，〈規範建構主義與兩岸關係：理論與實踐〉，吳玉山、包宗和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 年），頁 357-374；黃清賢，〈兩岸關係的辯證性建構〉，《遠景基金會季刊》，13 卷 3 期（2012 年 7 月），頁 49-94；葉定國，《論台灣的國家安全：一個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觀點的研究》（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⁴ Louis J. Halle,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 Primer for Nuclear Age, Vol. X; American Values Projected Abroa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p.4

⁵ 主張戰略研究重新定位的主流學者至少包括 Buzan、Walt、Betts 等人。請參閱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p. 368-74.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2(1991), pp.211-239; Richard K. Betts, "Is Strategy an Illus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2000), pp.5-50. 相關脈絡請參閱：陳文政、羅慶生，〈戰略研究的學科化與科學化〉，發表於「2012 年國關年會暨學術研會」（台中：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12 年 10 月 26 日）。

⁶ Ken Booth, "Strategy" in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London: Mansfield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09

⁷ 有關戰略研究的典範困境，請參閱：Ken Booth, "75 Years on: Rewriting the Subject's Past-Reinventing its Future." in Steven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感興趣，也是本文所探討的主題。

一、建構主義對安全研究的貢獻

對困擾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所強調的結構因素而難以突破的安全研究者來說，⁸建構主義適時的提供了解決之道：如果連無政府狀態都是人為而不是自然給定的，⁹那還有什麼國際結構能限制研究者突破現狀的思維？建構主義對安全研究能有重大貢獻，主要在突破理性主義所提出結構性限制，使得行動者(agents)的能動性(agency)得以凸顯。

雖然不是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首先使用建構主義概念，¹⁰但溫特(Alexander Wendt)卻是第一個對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與能動性問題質疑的學者。早在1987年他還是博士生的時候就提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行動者－結構」問題〉(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論文，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需要一種新的方法，把結構與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結合起來。1992年發表著名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一文，溫特承認國際結構的存在，但認為在華茲(Kenneth Waltz)提出的三個組成部分(秩序、區分、權力分配)之外，還應增加「體系中主體間建構起來的認同(identity)與利益結構」的第四個部份；他還原到自然狀態，以兩個行為體初次相遇的情形，來描繪制度與進程共同決定認同與利益的過程。¹¹在爾後發表的論文中，他雖然同意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分析的主要單位，但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e)，而不是全然物質性的，國家認同與利益是這些社會結構建構的重要部分，不是人性或國內政治體系的外在所給定。¹²這意味著國際體系的結構是國家能動性下動態演變的過程，國家行為者可以透過某些行動，改變這些結構，而不是只能選擇接受或拒絕而已。

199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28-339; Barry Buzan,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⁸ 結構對能動性的制約一向是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者所困擾的問題，在結構制約下，行動者對許多安全問題的選項非常有限。McSweeney曾指出，行為者雖可能受到歷史、無知或國際權力結構的限制，然而即使沒有能力改變結構，但至少還有選擇接受或拒絕的機會。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14.

⁹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¹⁰ 被認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首次使用「建構主義」概念者是 Nicholas Onuf，他在1989年出版的《我們締造的世界：社會理論中的規則、規制與國際關係》(*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即是運用社會建構主義探討國際關係。

¹¹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pp.402-10.

¹²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1994), p.385.

Politics)一書中，溫特勾勒出國際間是如何透過「團體能動體」(corporate agency)來形成具有制約和建構雙重屬性的規範(norms)以約束國家行為，而國家則是如何透過學習來內化此一規範；以完整論證國際結構是透過社會建構而來。¹³他進一步指出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並不只一種邏輯，至少有敵人(enemy)、對手(rival)、朋友(friend)三種角色在主導體系。溫特借用懷特(Wight)的英國學派語言，提出霍布斯的(Hobbesian)、洛克的(Lockean)、康德的(Kantian)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霍布斯文化的邏輯是敵意，國家會採取改變現狀的方式摧毀或征服敵人，決策時通常往最壞處考量；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競爭，國家期望相互行為的基礎是承認主權，承認對方的生命、自由、財產，但仍有爭執甚至激化到使用暴力的可能；康德文化的基礎是友誼的角色結構，國家期望相互遵守不使用戰爭的非暴力規則，以及共同抵禦第三方的互助原則。¹⁴溫特認為，霍布斯文化的高死亡率將使人們有創建洛克文化的動機，而洛克文化的競爭推動毀滅性武器出現時則有往康德文化發展的契機。¹⁵這提供了安全研究者一個「目標性」的論述架構：國家安全戰略應以營造康德文化的國際安全環境為目標；同時也提供了「進程」的概念：具敵意雙方可從霍布斯文化，透過特定的社會建構過程，經洛克文化而往康德文化邁進。至於此特定的社會建構過程為何？溫特在描述洛克文化是如何往康德文化前進時，指出了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共同命運(Common fate)、同質性(Homogeneity)、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等四種主要變數，¹⁶這在理論上提供了「手段」概念，使得國家安全戰略的規劃者可以尋求操作這四個變數以往康德文化前進。或者，如果這四個變數實在過於抽象而難以實際操作時，至少還可以提供研究者一個分析架構，以解釋兩個洛克文化競爭者之所以能或不能邁向康德文化的原因。

除了溫特之外，瑪莎費尼爾(Martha Finnemore)在1996年出版的《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一書也分析了國家利益是如何透過社會建構作用而形成。她指出國家利益的形成受國際社會體系中「規範」和「認同」的影響與規定，只有在國際體系中確認自我身份或自我定位後，國家才可能相對的尋求自身利益的範圍、程度和數量問題。¹⁷這對安全研究者的意義是：國家利益既然與國際社會存有互動關係，那麼國家行為者就可以透過某些行動，來改變特定國家對其國家利益的認知。另一位建構主義的重要學者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則在《國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的規範與認同》(*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提出了更廣泛的安全研究途徑論述。他將文化與制度(即規範)視為環境結構，描繪了此一規範與認同、利益、政策等變項間的互動關係，進而規劃出五條國家安

¹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12.

¹⁴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40-8.

¹⁵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46-9.

¹⁶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60-2.

¹⁷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1.

全研究整合途徑。¹⁸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也注意到文化在安全研究中的意義，不過是運用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概念來描繪此一環境結構是如何影響行動者。他認為在相同狀態下被不同戰略文化社會化的決策者會做出不同的戰略選擇；不同的戰略文化決定了不同國家對於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等國際關係主題的認識，塑造了不同國家的身份認同和戰略偏好，進而決定了不同的戰略選擇。¹⁹

建構主義者並不否定國際結構的存在，只是他們強調社會的建構作用，認為世界除了物質結構外還存在觀念也就是社會結構，而在互為主體性下，社會結構是由行動者互相構成的；這意味者透過互動，每個行動者都有機會改變結構。因此，此一內涵廣泛，結合結構語言學、後現代政治理論、批判理論、文化與媒體研究、文學評論，以及其他學科或領域混合而成，²⁰目前存在許多爭論與派系區分，卻被認為具有建構國際關係大理論的「令人敬畏潛力」的學術領域，²¹雖然因其缺乏預測性而被批評，²²但對安全研究者來說，正是因為此一對未來的開放性態度而感到欣喜。因為，如果理論的預測性只是告訴行動者無論採取任何行動都無法脫離結構因素的限制，那麼運用該理論進行國家安全戰略的研究將是何等令人沮喪？提供一個突破結構限制的研究途徑，是建構主義對安全研究的重大貢獻。只是此一研究途徑，是否能對重視行動與能動性的戰略研究產生類似的啟發？

二、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趨勢？亦或現象？

相對於國際關係領域的高度重視，「探討國家間政治關係中使用武力意義」的戰略研究者原本並不太在意國際政治的結構限制，這是因為「戰爭」是戰略研究的核心概念，而戰爭的發生通常就意味著結構的改變。戰略研究雖定位為國際關係次領域，但研究典範與國際關係仍有本質上的差異：兩者雖然都重視戰爭，但戰略研究關切的是戰爭遂行與軍事行動，而國際關係學者則關切戰爭的起因與後果。²³對戰略研究者來說，國際結構雖然限制行動者的能動性，行動者卻可以透過武力的使用或威脅使用，突破國際結構的限制以爭取更大利益；如果戰爭因

¹⁸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2-62.

¹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²⁰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1 (1998), p.196.

²¹ Ole Wever,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oughts: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ver B. Benbaun & Ole W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25.

²²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第15卷，第2期，2001年，頁228-9。

²³ Richard K.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1997), p. 10.

而爆發，則無論勝負如何，都將形成新的國際結構。因而國際關係重視結構與角色，認為戰爭是角色間結構性失衡的結果，戰略研究則重視行動與能動性，主張戰爭是行動者戰略操作錯誤所引發。

不過，戰略研究這個冷戰期間紅極一時，強調行動與能動性的研究領域，卻在冷戰結束後愈來愈受到特定的國際政治結構制約，那就是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愈來愈多的實踐顯示，不以武力處理彼此爭端逐漸成為國際共識，如果發展成為穩固的制度（institutional），就意味著武力在國際衝突的處理上受限制甚至喪失功能。

探討當前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有不同面向：它可能是兩極對峙的緊密結構瓦解後國際權力重組，區域強權大國（great power）已有實力挑戰具全球利益的強權國（dominant nation）或彼此挑戰，因而在使用武力上自我克制，以避免兩敗俱傷而使其他大國有機會超越；也有可能是來自人類追求和平理念提升後的社會建構，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惡劣經驗使人們不願再經歷戰爭的恐懼，各國人民間密切的交往也使得在身份認同上不認為有真正的「敵人」存在；也或許是全球化使各國經濟利益緊密結合的結果，因為戰爭所獲得利益無法超過可能造成的損失，大國不願以武力來解決彼此的意志衝突，以免演變成全面性戰爭而造成當前生活方式「回不去了」的根本改變；再或許與高科技武器系統過於昂貴有關，即便對小國使用武力不致造成大國的戰爭風險，卻很可能耗費龐大的軍費支出也無法獲得所期望的相對應效果。然而無論各理論學派如何描述或解釋，我們注意到的現象是：在冷戰時期功效不彰的聯合國與其安全理事會地位愈來愈重要，包含使用與威脅使用在內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non-use of force principle），已透過聯合國憲章的修訂與連續的國際實踐，使得該原則具有「絕對規範」（peremptory norm）的地位。²⁴國際間逐漸形成共識，只有自衛權與經過安理會決議案授權的武力使用才具合法性。²⁵

要成為具規範性的普遍原則，則無論任何國家即便其擁有超級強大的武力，都要接受「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限制；我們注意到當代擁有超級武力的強權國（美國）雖然發展出道德上正義卻不符合法律的「正當性」論述，²⁶以支持其進行必要的（如反恐等）軍事干預，但若未經聯合國授權同樣受質疑。²⁷區域

²⁴ 蕭琇安，〈國際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與台海兩岸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1期（2007），頁152。

²⁵ Neils Blokker, "Is the Authorization Authorized? Powers and Practi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Authorise the Use of Force by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 No.3 (2000), pp. 541-5.

²⁶ Heather A. Wils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

²⁷ 例如2014年9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因美國人質被敘利亞境內的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公開斬首，表示要發動空襲和支持合作夥伴地面作戰部隊予以打擊時，俄羅斯即質疑：「這種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軍事行動將被視同侵略，嚴重違反國際法」。「歐巴馬擴大空襲敘利亞：未經同意就是侵略」，蘋果即時網，2014年9月12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912/468191/%E6%AD%90%E5%B7%B4%E9%A6%AC%E6%93%B4%E5%A4%A7%E7%A9%BA%E8%A5%B2%E3%80%80%E6%95%98%E5%88%A9%E4%BA%9E%EF%BC%9A%E6%9C%AA%E7%B6%93%E5%90%8C>

大國則缺乏正當性論述的空間，使用武力的限制更大，某些武力較弱的小國在特定條件下甚至可以挑戰大國；例如在南海島礁的主權爭議中，菲律賓、越南即曾出動海軍艦艇應對，反而中國避免動用軍事武力，2012 年的黃岩島事件中國即強調是派出海監、漁政等「政府公務船」而不是海軍。²⁸歐洲的俄羅斯同樣如此，2014 年的烏克蘭動亂中雖支持東部的親俄民兵，但堅決否認出兵參與戰事。²⁹同樣擁有相當武力的大國在處理彼此意志衝突時更為謹慎，雙方都避免先動手而讓對方有引用「自衛權」條款取得合法使用武力的機會，或者是遭國際譴責。例如日、中在 2014 年初的釣魚台島主權爭議中，雙方出動的水面艦艇都屬於警察性質的海警與海上保安廳，空中的解放軍與自衛隊戰機雖然頗有接觸，但都高度克制。2014 烏克蘭動亂中的歐盟與俄羅斯同樣如此；歐盟雖然對俄羅斯支持克里米亞獨立與支援烏東民兵不滿，但也避免武力介入，寧可選擇經濟手段制裁。

不過，即便經過連續性的國際實踐，現在推論「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終將成為一種穩固的國際制度仍然言之過早。目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雖然難以想像，但區域衝突仍偶有發生，軍事對峙也依然存在，只是主要行動者已開始避免或至少表明不會先使用武力處理意志衝突，即便屬於「亮劍」或「展示肌肉」性質的實彈演習或聯合軍演，也還要強調沒有針對性，以避免落人話柄。此一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無論判斷為短期現象或推論為長期趨勢，對當前的戰略研究者來說，即形成了一個限制了行動者能動性的非武力國際政治結構，國家將難以透過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爭取國家利益。

三、國際政治的非武力結構是行動者使用武力的戰略造成的

戰略研究重視行動與能動性，學科屬性被認為是應用科學而不是純科學，³⁰在國家中心論以及武力本體論基礎下，行動者的能動性是表現在國家如何使用武力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若不能突破非武力的結構限制，即有喪失能動性的疑慮。喪失能動性的行動者既無法採取有意義的戰略行動，則應用科學屬性的戰略研究學術價值何在？要處理此武力功能流失的問題，我們試圖採用建構主義觀

%E6%84%8F%E5%B0%B1%E6%98%AF%E4%BE%B5%E7%95%A5。

中國雖沒有公開反對，但表示如果由聯合國主導，願意以軍事行動殲滅 IS。中國時報，「中國 IS 成員返恐 北京警戒」，2014 年 9 月 23 日，A12 版。

²⁸ 人民網，「外交部：中方向黃岩島海域派出的是政府公務船 不是軍艦」，2012 年 4 月 12 日，網易新聞：

<http://news.163.com/12/0412/18/7UTLPOI400014JB6.html>。

²⁹ 法新社，「俄否認出兵烏克蘭參與戰事」，2014 年 8 月 29 日，奇摩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4%BF%84%E5%90%A6%E8%AA%8D%E5%87%BA%E5%85%B5%E7%83%8F%E5%85%8B%E8%98%AD%E5%8F%83%E8%88%87%E6%88%B0%E4%BA%8B-220509449.html>。

³⁰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as a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1, No.4(1949), p.468.

點，解釋國際政治結構的非武力現象。

冷戰時期限制武力使用的結構性因素不是沒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核子冬天」假定下採取「相互保證毀滅」的核武戰略；人們擔憂核子戰爭將導致人類的滅亡，因而對先使用核武者給予全面報復式的懲罰，同時為避免升高為核子戰爭，也限制傳統武力的使用。不過這種結構限制反而促使戰略學者思考新的途徑，將武力的「不使用」也納入「使用武力意義」的範疇。葛雷（Colin S. Gray）即定義「戰略是軍事力量與政治意圖之間的橋樑，既不是軍事力量，也不是政治意圖，而是為了達成政策目的，選擇使用或不使用武力之研究」。³¹冷戰時期對核子戰略的研究即聚焦於核子武器的「不使用」上，認為若「使用」，即為嚇阻戰略的失敗。在傳統武力的使用上，古典傳略學者薄富爾（Andre Beaufre）提出行動戰略（strategy of action）的概念，主張在核子陰影下，應盡量利用剩餘的行動自由而採取積極主動的行動，並將行動戰略區分為直接戰略與間接戰略，前者以運用軍事力量為主，後者則將軍事力量作為輔助角色。³²冷戰時期對武力的運用是積極但自我克制的，雙方陣營雖然都擁有大量且調動頻繁的傳統武力，但在自我約束下使武裝衝突即便發生，³³也限制在特定範圍內不致擴大。發展強大甚至具毀滅性的武力但不使用，正是「冷戰」之所以為「冷戰」的本質。因此雖然有結構性限制，但透過核武的不使用與傳統武力的克制使用，冷戰雙方仍可採取有意義的戰略行動以爭取利益或阻止對方爭取利益；戰略仍有能動性，戰略研究因而有段黃金時期。

冷戰時期核武不使用與傳統武力克制使用的結構限制，雖然從現實主義觀點是來自兩極對抗的國際政治結構，但如果我們引用建構主義的互為主體性觀點，將可以從新的視野探究此一國際戰略社群的社會結構是如何由行動者的互動相互構成。冷戰時期的行動者相信，若我採取武力行動，對方必然會使用武力報復，最後可能升級為無法承受的全面性核武戰爭，因而透過不使用或克制使用武力的概念操作戰略行動。這表示此一對武力行動的結構性制約是「核子冬天」假定下採取「相互保證毀滅」核武戰略的結果：雙方都假定核子武器若被迫使用，將引爆全面性核子戰爭而導致人類社會的毀滅，因而自我克制，避免將對方或自己逼到不得不使用核武以確保國家生存或安全的牆角。如此，正如同溫特所主張「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限制使用武力的國際政治結構，其實是由國家自己的戰略行動造成的。

以同樣的觀點探討當前的國際政治，雖然形成的脈絡不同，但限制武力使用的規範形成卻與冷戰時期有相同邏輯：非武力結構來自於行動者使用武力的戰略行動，尤其是超級強權與區域大國間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戰略互動。如果不是超級強權雖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但仍願意相對的遵守不使用武力的國際規範，同時還主導制裁擁有相對優勢武力的大國擅自使用武力（如 1991 年的波灣戰

³¹ 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

³² Andre Beaufre, R. H. Barry trans,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³³ 這種自我約束較明顯的例子包括美國在韓戰時反對中華民國國軍發動配合性的反攻，蘇聯與中共在越戰時並沒有直接派兵參戰等。

爭)，我們很難想像區域大國在面對弱勢武力的鄰邦挑戰時（如 2012 年黃岩島事件中的中國與 2014 年烏克蘭動亂中的俄羅斯），還能夠自我克制的不使用武力。透過實踐與進程，在互為主體性下各主要國家使用武力的戰略，形成了當前國際政治結構的非武力現象。

四、非武力的戰略行動

建構主義的相互主體性論述指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自己造成的，不只存在一種邏輯，行動者能透過認同、利益、規範、制度等社會建構物的再建構而改變結構。採用此一社會建構觀點，可以理解國際體系限制武力使用的結構同樣是國家自己造成的，同樣不只存一種邏輯，行動者應也可以透過特定的戰略行動以改變此一結構。

在以往武力使用只受內部結構制約的時代，行動者經常使用武力向外掠奪或擴張權力；冷戰時期則因對全面核子戰爭的恐懼，於是透過嚇阻戰略限制核武器的使用；當代則在核武管制的制度化後，進一步將類似的限制擴展到傳統武力上。從建構主義觀點，近代限制武力使用的規範有其進程，不過，若預測最終實踐結果是國際間終將形成「非武力」的穩固制度，則屬於理想主義的樂觀。戰爭的高死亡率與毀滅性武器雖然提供了人們從霍布斯文化創建洛克文化，甚至進一步往康德文化發展的動機，但長期的和平卻可能使人們忘記戰爭的痛苦，而選擇相反的社會建構過程。無政府狀態不只存一種邏輯，也不只存在一個固定的實踐進程。只是現實主義信徒的戰略研究者若堅持武力為戰略行動的主要內涵，則將有喪失能動性的問題。限制武力使用的結構既來自行動者使用武力的戰略，就意味著武力使用本身是被拘束在結構之內的，如此除非特定行動者發動戰爭且戰爭的結果造成此結構的崩解，否則武力的使用或不使用都只是結構的內部因素，不能改變或突破結構的制約。能夠改變武力使用結構的是非武力的外部因素；我們從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以至冷戰結束的實踐經驗觀察，即可理解雖然冷戰結構的形成是雙方武力使用的戰略，但終結冷戰的因素卻不是武力，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這也就是說，行動者如果要突破非武力的結構制約而繼續保有能動性，戰略行動就必須尋求武力之外的戰略工具。

就如同工匠製作器物時需從工具箱選擇適當工具，戰略計畫者在擬定戰略計畫時也是從特定的戰略工具箱選取工具。對國家行動者而言，這個戰略工具箱是擺放著包括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法律、資訊...等等各式不同的工具。如果採用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所提出並由國際關係學者羅昆斯與斯坦（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所引申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概念理解，那麼只要是能達到特定政治目標，國家可以操作的一切力量或資源，都屬

於戰略工具的範圍。³⁴在以往國際規範容許使用武力掠奪或擴張權力的時代，武力顯然是戰略工具箱中最有效的工具。冷戰時代的戰略學者在核子戰爭制約下，發現武力工具除了使用之外還有不使用的意義；而冷戰的終結則說明，如果搭配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工具，武力的不使用比起真正使用有更好的效果。當前非武力化的國際政治結構已將對武力限制，擴展到傳統武力上。武力工具既然被限制使用，則行動者選取非武力工具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將是保有能動性的合理選擇。建構主義的溫特在描述洛克文化如何往康德文化前進的過程中所指出了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自我約束等四個主要變數，如果從工具或手段的意義面向理解，那麼自我約束是否定武力等強制性工具的使用，而其他變數則指出非武力工具的功能。

國際政治的非武力結構使國家的戰略行動須選用非武力工具以保持能動性，不過這不表示戰略的去武力化或武力工具喪失其戰略意義。武力是戰略的核心概念，戰略工具箱的特色就是武力通常被擺放在最明顯位置。缺乏武力的工具箱將不再是戰略工具箱，只不過相較於早期及冷戰時期武力使用（或不使用）在達到特定政治目標時的高功能，當前戰略工具箱的工具是愈來愈豐富，相對的使武力工具的擺放不再那麼順手。

因此，強調國際政治的非武力結構絕不意味著主張解除武裝，事實上正相反，當前對武力限制的效果與冷戰時期的核武是同個邏輯：冷戰時期核武的不使用不是透過銷毀核武而是擁有足夠報復的核武，行動者才會採取自我克制的戰略行動，避免將對方或自己逼到不得不使用核武以確保國家生存的牆角；當前「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若要成為制度性的規範，同樣必須要有足夠武力，才能迫使行動者維持自我克制的戰略，以避免將自己與對手逼到不得不使用武力的牆角。正如建構主義指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國家能動性下動態演變的過程，即便我們同意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是個趨勢而不只是現象，在非武力結構限制下國家行動者仍可以運用某些非武力工具改變這個結構，戰略行動仍有意義。

結論

探討建構主義對戰略研究的啟發，就是嘗試以建構主義觀點探討戰略研究的問題。本文指出當前國際政治有去武力化的現象，並透過建構主義的社會建構觀點論理解，那可能是個從近代使用武力掠奪、冷戰限制核武，到當前限制傳統武力的實踐進程。並依據建構主義的相互主體性論述，指出國際政治的非武力結構，都是行動者使用武力的戰略所造成的，預測最終實踐的結果將形成去武力的

³⁴ Rosecrance 與 Stein 主張國家要有效運用可以支配的全部資源（不僅是軍事資源），以確保平時和戰時的國家安全。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

穩固制度為理想主義的樂觀，但現實主義的戰略研究若仍堅持武力為戰略行動的主要內涵，則同樣有喪失能動性的問題。

戰略研究的核心議題是武力、行動與能動性，重視實用；當代國際政治去武力的社會建構已使武力逐漸流失其在國際意志衝突處理上的功能，軍事武力已不能與國家權力直接劃等號。因此，正如同冷戰時期將「不使用」納入「武力使用」範疇而創造戰略研究的黃金時期，當前「探討國家間政治關係中使用武力意義」時可嘗試將「非武力」概念也納入「武力意義」之內；將非武力工具加入武力（包括使用與不使用）的基酒中，調配出雞尾酒式的戰略行動，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維持行動者的能動性。本文提出戰略工具箱概念，指出只要能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則國家所有可以操作運用的力量或資源，都屬於戰略工具箱的範圍。當前非武力的國際政治結構下是誰先使用武力，誰就喪失武力使用的正當性，因而應將武力回歸其原本防範外敵入侵的功能，而在處理意志衝突時，優先選用非武力工具。戰略研究雖在擴展，但不是議題的擴展而是工具的擴展。

因此，若理解當代的戰略工具是在擴展，武力在處理意志衝突功能逐漸流失的同時，其它工具尤其經濟與文化的功能相對愈來愈強，即可認知行動者是將操作非武力工具，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所有國家能運用的力量或資源都有戰略意義，在整體考量下不能單獨分割出「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經濟歸經濟」之類的命題。而即便武力功能流失，無視鄰國的強大武力而縮減國防支出仍可能不是個適宜的戰略選項；國際政治的去武力化還是個實踐中的進程，並不只存在一個發展方向。